



蔣慰堂先生的宗教信仰生活

龔士榮

蔣慰堂（復聰）先生出身書香之家，幼讀古聖賢書，後入北京大學就讀，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。故都各校學生遊行示威，先生亦參與其事；後曾執教於清華大學，又從梁啟超先生遊，開始了先生一生的圖書館生涯。先生自稱「我的青年期……心目中總把公教（天主教）認為洋教，潛伏著一種仇恨的心理」。民國四十一年，先生突然皈依天主教，且信教篤誠，無怪有許多朋友向先生探詢：「為什麼信天主教？」為答覆這些朋友，先生謙虛的說：「仰賴天主的庇佑，寫了幾篇文章，譯了幾段經文，來訴說我的信仰。」四十七年六月，應光啟出版社之請，彙集所撰闡釋天主教義的論文九篇、贊訟四篇及翻譯天主教經典七章，署曰《訴信錄》，交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嚴文郁教授在他所寫〈蔣復聰的宗教思想與辦事精神〉一文中說：「在此期間，蔣先生的人生觀及生活方式起了很大變化，即是皈依天主教。」本文擬就先生的信仰歷程及在生活中的影響，試略述其梗概。

一、與天主教的接觸

先生在《訴信錄——生活中的體會》一段文章中，說：

「我生於浙江海寧縣的硤石鎮。離硤石鎮約有五里之遠的一個村，名為車輻濱……我在五歲

時，隨同先母去過一次，至今常依稀記得。在這個村裡，天主教會建築有宏偉的教堂、修院、醫院、育嬰堂、養老院等……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聖教會，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，覺得幽靜明潔，與我們所居的鄉鎮，大不相同。我於一九三〇年赴德留學，在歐洲看了許多有名的教堂，增加了歷史的認識及藝術的欣賞。從藝術方面看，則教堂是集繪畫及雕刻的七成，完美地表現在教堂的建築，教堂是西洋藝術的代表作品……從歷史方面看，則中世紀是天主教的世紀，她保存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，融會貫通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；她又孕育了近世紀文化，承上啟下，產生了近世紀的西洋文化，所以要瞭解西洋文化，非瞭解西洋文化的背景天主教不可；我在歐洲觀察的結果，引起了我對天主教會的注意。回國後，我因建築中央圖書館館廈，向天主教商洽了一塊屬於教會的基地，因而認識了于斌總主教，更因而認識了天主教會的組織與制度。」

二、皈依天主教

慰堂先生對天主教的認識，在抗戰前就已經有了，為何遲遲到民國四十一年十月才受洗奉教呢？《訴信錄》開宗明義第一句話，慰堂先生說：「我蒙天主聖寵，領洗已有五年了。」是天主的聖寵使先生領洗的。天主的聖寵如何逐步帶領先生進入了信仰之門，似也有跡可循的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先生應聯教組織的邀請，赴歐洲研究圖書館事業，先後考察法、英、丹麥、西德、瑞士，歷時半載，並奉教育部令，代表我國出席巴黎聯教會議；十月先生自巴黎東裝返國，時廣州已陷，中央圖書館亦已裁併，遂暫居香港，以教書為生。四十年五月，先生應臺灣大學之請，

自港來台，講授國文。

在〈聖女小德蘭傳教區主保彌撒致辭〉一文中，先生說：

「我如何認識龔士榮神父呢？這實在是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與龔神父同在台大法學院教書，下課後有雨，我忘了帶雨具，他幫忙我叫車，我為他熱心的愛德所感動，因此認識而聽道；他叫我先看《一朵小白花》，也許是聖寵到了，我迫不及待要領洗，領完洗，然後聽道。我的親戚本家，凡經我介紹的，都由龔神父講道付洗，到今天我還到華山堂望彌撒，聽龔神父講道。」

以上是先生所記和筆者相識而聽道的經過；筆者當時送他一本《一朵小白花》，是聖女小德蘭的自傳，也送他一本《要理問答》，內有教義、教規、聖事、祈禱等扼要的說明；並介紹他看《天主教精義》一書，他很快的都看完了，當然還有一本吳經熊先生所譯的新經（約）全集。筆者覺得應有不少問題尚須討論，先生告誡如其所說，要求「領完洗，然後聽道」。於是決定於先生所欽敬的聖女小德蘭慶日，即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日，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二段五十號聖家堂舉行洗禮，洗名保祿，並由肥料公司總經理、先生的留德同學湯元吉博士擔任代父；翌年十月十四日領受堅振聖事。

三、信教後的宗教生活

先生領洗後，曾賦詩誌感。詩曰：

回生上藥沐春和
了悟人天瘥宿痾
目極浮雲移疊嶂
心澄碧水止層波
神宮葆衛三仇害
卸路追承十字磨
枝接葡萄豈易事
歸榮稱頌感恩多

先生在此詩的自注中說，領洗後，「心地光明，歸向天主，於是浮雲悉去，疊嶂盡除……煩惱之侵擾悉停……一切皆歸榮天主而稱頌焉」。

先生有何疊嶂、有何煩惱，筆者曾注意到先生領洗前常愁眉深鎖，似有重重心事壓身，但未便向先生詢問，先生也從未和筆者談過；直到先生逝世後，在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上，讀到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教授所寫的〈蔣復璁以館為家五十年〉的一篇文章後，才略知其一二。

先生受洗後，真如年表所脫：「信教篤誠，每日黎明即起，赴教堂望彌撒，風雨無阻，習以為常。」因為台大單身宿舍（在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二三〇巷八號）離聖家天主堂不遠，先生每天去望早晨六點鐘的彌撒。有一次冬天，天色未明，先生又匆匆趕去望彌撒，途中不慎跌了一跤，頭部受傷，先生還是負傷望完了彌撒，才去看醫生，其虔誠可見。他有時去蓬萊新村望彌撒，耕莘文教

院成立後，就到文教院輔祭。先生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，因路途較遠，乃於主日（星期天）從外雙溪公館驅車前來華山天主堂（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）參加筆者主持的八點鐘彌撒，朗誦經文，高聲歌唱，至為感人；除因病或有要事外，從不缺席，直到最後。彌撒畢，先生輒邀筆者和幾位教友，往附近初期十分簡陋的豆漿店吃燒餅油條，有說有笑的談談家常，但從不批評人。先生也絕未以院長之尊，而略現有放下身段或擺架子的神情，一切都是那麼自然、那麼親切，只知道大家都是天主的兒女，因此備感溫馨。所以在教友們的心目中，先生真是一位十分平易近人的長者，謙卑忠厚的教友典範，都由衷的敬愛著先生。

四、宗教生活的體驗

先生的信教，不只在形式上行禮如儀，更在心靈和生活上有甚深的感受和改變。如他寫：

「中庸說：『洋洋乎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』我們望彌撒，就有這種感覺，天主就在目前。其實我們靜思祈禱，天主也在上面，聽我們的祈禱。」「我從生活中體會到有洋洋乎如在其上、如在其左右的天主！我一生的遭遇，都在天主聖寵養育之中，我的榮譽歡樂，固是天主的賞賜；就是我所感受的痛苦，未嘗不是天主的懲戒，要成全我這腐朽不才之人。」

「我又能體會到聖葆樂所致格林多人書二說：『爾曹詎不知基督實於爾心中乎？』天主居我心中，因此我體會到朱子所不能明悉以言的『慎獨』，在天主教教義中得到瞭解，豁然明朗，使我思言行動，不敢不敬，不敢不慎。然而三仇為害，自訟改過，每有不建，實有賴於天主教的

告解，然後心安理得。因為我有天主及天主居我心中的體會，所以不敢不信。」

按先生也時行告解，「三仇」指魔、欲、俗三方面的誘惑。

四十三年八月，教育部命令先生籌備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，但缺乏經費；先生說：

「我抱定宗旨，與過去一樣，再事苦幹。但是我的心情，則與過去不同。從前我憑一個人的毅力去幹，其實天主已經幫忙了，照我現在的體會。現在我是天主教徒，我有天主可以依靠，我可以向他祈禱。從四十九年起五十五年……可靠的經費只有一百六十萬，但我造了三百萬的房子，最困難的時候，只有每天看天亮，立刻起身到堂裡去望彌撒，向天主祈禱，一草一木是天主假我手造的。我是天主的工人。我的工作愈是順利，我愈感到渺小，沒有天主，我什麼也不能做。」

嚴文郁在上述的文章裡也寫道：

「中央圖書館初復館時，房屋和經費皆受限制，蔣先生信心十足，勇往直前。他認為：『在事業上則困難重重，弟抱定主張，從早到晚，稍有精力，盡量消耗，到晚一睡，明日再幹，不去問時間，亦不去問有多少能力，做了再說。總之，百事艱難，中國圖書館事業真一可憐之事業也。弟虛度五十餘年，今始知宗教對人生關係。』在最艱苦的時候，他不灰心，仍覺神在支持他，所以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使他奮鬥下去。」

先生又說：

「民國五十四年八月，我接受了政府第二個使命，擔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……與辦中央圖書館是大大不同……規模大、經費多、人員多，幫忙也多……十八年來，國內外聲譽甚好，都是

我長官的指示和同事的幫忙，我都歸功於天主的恩典，使無能的我能夠做事。」

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四日，先生輕度中風，送進榮民總醫院，做物理治療。先生說：「人說養病先需養心，心有主宰，依靠天主……我除祈禱外，絲毫不急……這次大病承榮總醫生悉心治療……聖教會各位……為我祈禱，送聖體，蒙天主大恩，才見痊癒。我無法說明我內心的感謝與不安……我決定退休……蒙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，頒給二等景星勳章……我何德何能，如何敢當，這都是天主的聖寵，我再不能說什麼了。」

五、思想上的新了解

先生在《訴信錄》中說：

「吾的信公教，可說是在我思想的一個徹底的瞭解，也是一個中國人的徹底瞭解。」

試就先生的「徹底了解」，略述其一二。

(一)「相信天主在一切之內，中國的文化，西洋的文化，真理惟一，沒有不同源的。」

(二)「基督教義實與儒家學說相互發明並不相背，意天主微言大義早已垂憲於中國思想之中……其實相合相同者多矣，特吾人未覺察之耳。如『天人合一』乃中國之基本思想，及『與天主契合』之天主教教義有何不同？耶穌言『愛』與孔子言『仁』，宛若出諸一口。蓋中西思想均以人本於天，故一視同仁，和平樂處。」（致海滌凡先生函）

(三)「文化必有其體，體立而後用備。清末張之洞所謂『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』，當成過去；即

全盤西化，僅著眼於人生實用，所謂形不器末之學，不能上達於道，有何用哉？探源尋委，則西方文化實以基督教為其體，為其骨幹，故吾人欲追步西方，則捨此大道莫由。」

(四)「天主教教義實是系統化的中國思想，最完善的天道觀念：中國人要聞孔子不言的『性與天道』，及要知道莊子所謂『神何由降、明何由出、聖有所生、王有所成』，所以『反本歸宗』、『忘羊歸棧』，中國人因固有文化的『天道觀念』的認識而信仰天主，這是天主教最可樂觀的展望。」

(五)人們在痛苦的時候，要以苦為樂，得到心靈上的平安，這是非求諸基督不可。

(六)天主教的彌撒，是教會祈禱的中心，也是教友生活的中心。教友受洗入教之後，他生活的對象是天主，一切都為了天主，與天主結合，於是中國所謂「天人合一」，「與天地合其德」。彌撒是教友與替耶穌行聖祭的神父一起祈禱、一起奉獻，最後一起領聖體，與耶穌最親密的結合。本來「祭者際也」，祭祀原是人神的交際，與天主教的彌撒，在意義上是相同的。

(七)各民族本於天命，而自然崇拜，凡所記載，皆不知不覺的流露，與天主教思想適相符合。耶穌降世救贖，親自建立聖而公教會，補充自然信仰的不足而給以新的啟示；所以公教是上承天主之命。要「遍歷寰宇，宣傳福音於普天生靈」。這就是中國古籍中含有天主教思想的道理。總而言之，天主教不是洋教，是中國的天主教，是世界的公教。

先生領洗後勤讀聖經，參閱教義著作，因以用天主教教義來詮釋中國古籍。從而獲得新的瞭解，或如先生所說的「徹底了解」尚多。其見諸文字者，大都收錄在《珍帚齋文集》卷四中，不再贅述。

六、譯經

先生給嚴文郁先生的信中有「天主教經文譯過七、八種，作為練習」。這是幾篇教友常誦的經文。先生由原譯文言文改譯成韻文，以便教友易於背誦詠唱，這此譯作都收錄在《文集》卷四中。在譯經過程中有時為了一個字或一小句，和筆者討論了多日；如天主經（主禱文）的最後一句，原譯是「乃救我於凶惡」，為了押韻，改譯成「救我出沉淪」。「凶惡」與「沉淪」間，總覺不甚妥切；因一時想不出更好的字句，先生引孔子「小德出入可也」（《論語·子張》），笑著把它保留了下來！

先生以後也和吳經熊先生曾一度參加中國主教團的譯經委員會，也寫過一篇〈中國譯經事業〉的文章，收錄在《珍帚齋文集》卷四中，有精闢的見解，誠摯的建議。

七、傳教

在〈青年的傳教工作〉一篇文章中，先生說：

「諸位雖然受洗得救，但是教友是有傳教責任的……我們受洗之後，是天主的義子，子繼父業，這是當然的事……耶穌在十二歲的時候，就在聖殿講道，我們既然與基督同為天主的繼承人，又是基督之徒，自然應當效法基督同為天主的繼承人，又是基督之徒，自然應當效法基督講道，自然有宣傳福音的責任。聖葆樂致提多書說：『務望訓人以正，納諸軌物。』孔子在《論

語》裡也說：『人能弘道。』又說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』儒家講推愛，仁民愛物，由近及遠，人是應當推己及人，有弘道之責的。」

教友既有傳教責任，青年教友當然不能例外……青年雖非兒童，究竟入世未深，無多惡習，比成年人純潔得多；純潔的人傳布福音，不是很適宜的嗎？

先生又指出傳教的方法說：

「如果要傳教，不能沒有方法，方法極簡單，從前人說，教育要以身教，教者要以身作則。傳教也是如此，要以身傳，青年傳教第一要能以身作則，如敦品勵學，博得人們的敬佩，自然容易傳教，否則人是不會信的。總之，要身體力行，不要說空話。」

嚴文郁教授在上述的文章中說：

「蔣先生不僅信教，而且傳教。他對朋友和學生，一有機會即傳播福音。我雖聞道在先，但熱忱不如。他嘗勸我說：『兄學養與品德與基督之真諦相合，故不必以少做宗教工作為嫌也。如日事宗教工作，而行為與之相悖，誠如聖經言『有何益耶』。中國文化及基督教義完全相同，此即救世界、救人類之寶物……兄信仰基督教，與天主教不同，但同一主、同一信仰、同一洗禮。今日教宗號召一切基督教徒聯合，則吾等因同道也。』這不是隨處皆在傳教麼？」

先生心儀徐光啟文定公，曾寫了一篇〈徐文定公對公教的貢獻〉的文章，文章中說，「文定的傳教工作，先從家庭開始」，先生信教後便勸在臺灣的親戚本家聽道領洗，又勸中央圖書館的同仁們能聽道，因而有不少領洗入教的；在和相識談話中，如有機會總勸他們去聽聽道，和友好書信往還中，也時常向他們傳教，如嚴文郁先生所記的便是一例。

八、護教

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在自由中國並沒有真正的「教難」，但先生說：「吾們中國人有很大的困難，尤其是讀書人，為什麼呢？第一、在西洋新教育思想傳入中國後，認為宗教信仰是不科學，是迷信，所以一般和知識分子都不談宗教，對宗教信仰是一大打擊……（其次）近代哲學家，反對宗教信仰的人，都反對啟示。……還有中國人總以為吾們的孔孟之道是國家民族的正統文化，足以修身，無須宗教，更不需要洋教的天主教……。」先生引經據典，指出其誤解所有，尤其為天主教絕非洋教而辯護。教會方面如有困難，有求諸先生，先生必各處奔走，全力以赴。

九、結論

以上是筆者就慰堂先生的宗教生活所做的簡單報告；由於他的信仰虔誠，努力宗教工作，蒙羅馬教廷錫封為聖額我略騎士。他洗名保祿，常以徐保祿光啟文定公為典範，他說：「徐文定公因有堅強的信德，才能毅然信教，更能以與人為善的精神，從事傳教，並且用大無畏的精神來護教，這是天主特別賞賜聖寵，使徐文定公在中華開教上著善行、立善表。」先生這番對文定公所說的話，無異是夫子自道。謹以此蕪文紀念慰堂先生的百歲冥誕，並祝先生在天國享永生。

（本文原載於《蔣復聰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文集》）

龔士榮（？至二〇〇二），上海徐匯神哲學院碩士、北平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，為天主教神學教授。曾擔任台中靜宜女子英文專科學校校長、輔仁大學教授、輔仁大學校史室主任，並受聘為輔仁大學終身講座教授。

敬啟者，您好：

關於本篇文章，編者蔣祖怡與編輯團隊曾嘗試尋找龔士榮神父的相關親屬，但無任何結果。感念蔣祖怡先生為紀念蔣復聰先生，加上本書出版在即，暫以本文附註聲明方式宣告，以利本書順利出版。

若有龔士榮神父的相關親屬看到本聲明，歡迎主動聯繫本出版社。

以上聲明

思行出版社

蔣祖怡

祖怡